



日本政党体制转换的社会成因

高 洪

政党制度是指某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党政治体系。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这种反映政党直接或间接参政的合法方式，通常表现为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等不同形式，并在历史转折时期伴随社会潮流涌动发生变异。世纪之交的日本政党制度正处在体系转换时期，其起因和走势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造成日本政党制度变化的因素是复杂的，其中既包含着政党政治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又不能排除某些非政治性因素对政治操作过程的投射作用；既受到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深刻影响，又刻着时代变迁给政治机制留下的印记。本文拟从推动日本政党制度转变的潜在要素入手，对近年来日本政党体制、模式的变化进行尝试性分析。

一、国民的世代交替导致政党政治基础不断变化

政治发展的核心是人，政党制度变化的根本同样是人。作为“政治人”整体的国民群体，处于连续不断的新陈代谢过程，尽管我们可以笼统地抽象出政治学意义上的“人”，但实际上流动的日本国民群体始终处在世代更新的变化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民世代交替决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递进过程，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与社会环境下，过去的青年与现在的青年会产生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念；过去的中年与现在的中年有着时移事殊的生活体验；过去的老年与现在的老年抱有千差万别的心理感受。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多元的政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过去保守与革新政党的意识形态对立，更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政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因此，具体分析、研究今天的日本公众政治思考的变化，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党政治体系发展、停止或衰败的过程。首先，今天的国民对政党的选择已经不同以往。日本是长寿国家，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超过两千万，接近总人口的20%。加上出生率逐年下降，形成了所谓“老龄少子”的世纪末人口结构危机。观察不同年龄梯次的政党支持状况，50年代中期确立“保革对立体制”时的选民大部分已经谢世，其余部分也因年逾古稀，正在向脱离政治生活的垂暮之年过渡。从各个年龄段的人数来看，50岁上下这一年龄段的人，即出生在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期的所谓“团块世代”，比其他任何一个年龄段都多。他们的童年经历了战后经济复兴走向高速增长的转

变，在经济起飞的辛劳中度过了青春年华。就政治意识而言，“团块世代”的大半生都处于自民党的独家统治之下，他们依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分别支持保守政党或革新政党，这种政治选择曾经是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的原动力。现在，这支在社会上影响极大的队伍正在步入老龄者后备军的行列，他们的政党支持取向与选票投向把党派斗争的焦点聚合到“福利政策”、“生活保障”、“老年养护”等领域，也使“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之争成为朝野政党间党派斗争新的焦点。相形之下，目前40岁上下的选民则较前者晚了一个“节气”。这一代人同时受到传统与现实的双重熏陶，对政党政治的思考处于一种承前启后的复杂状态。由于“1955年体制”结束后各个政党的政策主张趋同，人们已经不能用过去的“分别代表贫富阶级”的观念来给政党简单划线，因此这一代人开始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不同政党。至于20—30多岁的选民，他们从感情上说对自民党这样老牌的执政党缺乏好感，与中老年群体比较而言，更容易倾向于某些“新鲜”的党派。

①

其次，世代交替引起国民对政府政策的不同反响。日本政治面临的另一个新问题是不同年龄群体在认同政策方面表现的对立倾向。在冷战时期，自民党代表富有阶层，社会党和日共代表贫困阶层，加上公明党等主张的中间道路，政策之争主要体现的是阶级属性即是有利于富有者还是倾向于帮助穷困者的争论，政府的经济政策更多地表现为对不同阶级、阶层或某一特定社会集团的倾斜。而现在，尽管今年年初始动的“自自联合政权”中小泽一郎及其追随者的主张明显有利于富有者，但处于主导地位的自民党深知假如仅仅维护富有者的利益。就难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事实上，小渊政权也只能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适当照顾贫困者的利益。1998年振兴公共事业的举措，就一直在扩大就业和提高经济效益之间摇摆。

于是，随着政策的阶级属性消退，各个年龄段国民之间的政见分歧便凸现出来。比如，在关于年金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上出现的对立，就集中表现在年龄层次上。1999年1月，政府接受了公明党前一年提出的建议，推动“刺激消费，解开主妇们系死的钱袋”的“商品券”政策正式出台。这笔总值高达7700亿日元的庞大开支，以每人两万日元数额的免费购物券形式，主要投向65岁以上老人和15岁以下儿童，成为以年龄划线的经济对策的最初尝试。

最后，国民群体的构成变化还影响到公众对政治道德标准的基本判断。不同年龄群体政治观点的对立不仅表现为对某一政策主张的好恶，更深刻地表现为政治价值判断方面的明显区别。观察日本国民对政治的理解，传统与现代观念确已出现两点明显区别。第一，上一代人认为政治是第一性的，倾向于把政治当成最高一级的职务，推崇诸如田中角荣那种英雄般的政治领袖。而在新一代日本人眼中，政治在他们的生活里仅仅是属于第二性的东西，他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意向去安排生活，甚至把从事政治活动看作是肮脏的职业。这不禁令人想起西方政治学者米诺格教授对后现代社会里人们对政治功能与地位判断的精彩概括：“现代社会的政治只是这样一种活动，它支撑着人类生活的框架，但并不等于生活本身——政治能为生活提供许多方面的秩序，但却必须与上述领域保持一定的距离。……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服务行业。”第二，是对政治家道德标准的判断方面的差异。现代日本政治不是割断传统在白纸上凭空设计的，传统的武家政治中严紧的主从关系，主仆间的政治忠诚在战后相当一个时期仍被看作政治家的美德。然而，新一代人的价值判断是把现代政治看作宽容的自由竞争，既无忠奸之分，也不要求对某个政治领袖保持绝对的忠诚。换言之，政治家同每个国民一样，尽可以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不断变换自己的选择。所以，虽然在耄耋之年的一代人看来，1993年以来从自民党里扯旗造反的政治家们皆非良善之辈，因为他们在将近6年的分化组合过程中反反复复地聚散离合，颇有些翻手为云、覆手为

雨的阴谋味道；但新一代人却对此给予一定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小泽一郎为了挽回自由党的颓势可以与自民党重归于好，而小渊惠三领导下的自民党方面只要认定是自己政治操作需要的策略，也完全可以不咎既往，与过去的“叛贼”重新联手。

二、新型利益集团与集合群体带来的变化

长期以来，各种形式的利益集团一直是日本战后议会民主政治的必要补充。在冷战体制下，国际上两大阵营对垒以及日本国内政治上的“保革对立”，给自民党创造了稳定而雄厚的统治基础。在原有政治模式下，利益集团是与政党政治相匹配的存在，尤其是在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批能够影响决策过程的利益集团环绕在执政的自民党麾下，形成了一道独具日本特色的政治风景线。

冷战的结束使自民党在搞垮社会党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社会基础。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后，扩大利益分配的渠道逐渐狭窄，利益集团参与政治过程的行为方式不得不从原来的利益获取型转变为保护既得利益的自我防护型。1993年自民党因金钱丑闻和政策失误丢掉政权时，连长期与其处于共生状态的财界四团体也纷纷为自己洗清干系。但自民党毕竟是多年掌政的大党，经过数年惨淡经营，到1997年底第二次桥本内阁时期，总算完成了从有限参政到幕后主政及至独家执政的“复权三部曲”。不过，大部分利益集团的政治选择却在新形势下趋向支持复数政党，结果自民党党势明显衰落，已经无力重演当年一党把持政权的历史。加之全球范围的金融风暴骤起，给企图通过六大改革恢复景气的桥本政权以致命的打击，也从政治上告诫继任的小渊政权：自民党的统治基础与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只有同其他党派适当妥协，拿出符合国民中强有力的政治集合群体利益的政策，才有可能延长自己的政治寿命。这一变化决定了近期日本政党政治的模式只能是自民党通过政策合作或联合政权方式，拉拢一两个小党对垒以民主党为主体的在野党政治联合，“一强多弱”则是对这一局面的概括。

从一定意义上讲，日本政党制度的上述变化代表着某种进步。因为，在“1955年体制”下，尽管社会上存在复数政党，理论上这些政党都可以执政，但在长达38年的岁月里政权却始终为自民党垄断，实际上是一种无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就此而言，1993年自诩为“万年执政党”的自民党下野，意味着日本的政党制度开始从无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向竞争性政党制度转变。

与此相适应，社会上出现了与以往按职业及教派划分的利益集团完全不同的集合体。这种适应后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新型集合群体在构成和作用方面区别于过去的利益集团。按照东京大学佐佐木毅教授的观点，目前对日本政治影响最大的是以下三个群体：第一，高龄者群体，其中包括目前50—60岁左右的高龄者后备军。随着这个群体以惊人速度不断增长，他们的政治认同对政党制度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②

第二，中央、地方政府与民间共同出资建立的事业团体，其中还包含负责公共事业的官僚集团，他们既是政治性的选举机器，又拥有操作层面的巨大实力，是把政治与行政视为一体的新型群体；第三，完全融入国际市场的跨国集团，如丰田、松下、本田等跨国公司，从广义上讲还包括各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后两者虽然人数不多，但因其巨大的政治、经济能量，同样能够影响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今后政党政治与党派自身的进退取

舍都同这一类政治群体密切相关，两者间的关系也将成为政党政治研究领域里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三、影视媒体对政党制度的影响不断增强

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以报业为主的大众传媒是相对独立于三大政治权力之外的“第四大政治权力”。如同拿破仑所言：“三份带有敌意的报纸，胜过一千把闪亮的刺刀。”日本是报刊大国，在各种形式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抽样调查中，报纸曾连年高居榜首。无论是反映保守本流意识的《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还是分别带有激进色彩和民族主义色彩的《朝日新闻》和《产经新闻》等发行量巨大的综合性全国大报，都拥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然而，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报纸在政治报道方面的巅峰地位正在被电视和计算机网络所取代。1998年，各大报刊版面均有下降，其中《朝日新闻》下降12%之多。

③

现代快节奏生活中，集声、像、图、文为一体的电视正在成为日本民众与政治生活联系的重要桥梁。1998年5月，世界电视会议在法国戛纳举行。会议公布了欧洲数据电视公司对发达国家人均收看电视时间的统计，日本以平均每人每天4小时高居榜首，超过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等。有关收视时间长度的变化曲线还表明，日本人在电视机前度过的时光还有逐年增长趋势，看电视似乎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日本国内近年“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问卷调查中，电视机取代了报刊在必需品中独占鳌头，而在欧美国家则把电冰箱或汽车、电话列为必需品的首位。当然，在五花八门的电视节目里，政治性或带有较强政治性的内容并不很多。不过，鉴于电视声情并茂的特点，聪明的政治家们早就注意在镜头前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例如1979年11月，大平正芳同福田赳夫争夺政权时，两派的青年议员和秘书们就在自民党总部门前用桌椅筑起街垒，在电视摄影机前演出了一场攻防战。到了今天，“争取民心的表演才能”已是政治家必备的条件之一。现行的《选举法》规定了候选人在电视上阐述政见的时间限制，国会期间和重大政治事件的跟踪报道更是政治家们展示自己以争取国民支持理解，进而募集选票的主要渠道。当然，电视有时也会把惯于玩弄“密室政治把戏”的日本政治家的隐私暴露无遗，在一定意义可以说，田中角荣的洛克希德事件、金丸信的政治丑闻等，都是通过电视昭然于天下的。这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功能，使得政治家十分小心。

最近几年，广播、电视行业遇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计算机通讯技术飞跃发展后，互联网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出极大效用。尤其是对青年一代，漫游在计算机网络空间，从党派的网页获得自己感兴趣的政治信息，较之以往的一切方式来得更加便利。不仅如此，网络技术还为每位客户提供了自由阐述个人政治观点、针砭时弊或臧否政治人物的活动空间，这种可以同对方展开双向交流的手段，使其他媒体黯然失色。估计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用计算机投票选举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关于信息化社会里具有影视效果的大众传媒的社会政治功能，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通过大量直观的宣传报道强化公民的政治认知，间接左右民众的政治立场。人类的社会生活离不开信息，而各种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又必然带有某种倾向和主观色彩，并对信息的接受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近年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到了危及生活的程度，使国民重新关注起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政治事务。这种告别政治冷漠的权利意识复

息公开化，渴望“知情权利”的呼声在不断高涨。这一切给大众传媒赋予了丰富的政治内容，同时也使传播媒介本身成了政治运作过程中行之有效的工具。大众传媒如同一把灵巧的雕刻刀，在影响国民政治态度的同时，为政党塑造出导致人心向背的政治形象。

第二，影视媒体起着监督政府的监测器的作用。金钱政治是日本政党与政治家罹患经年的痼疾，虽然日本政治家们大多精通从政技巧，但非法谋取政治捐款和钱权交易毕竟是违法行为。对此，大众传媒担负着揭露社会政治阴暗面的重要责任。也许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缘故，在日本以报道政治事件内幕为职业的记者们也的确不是等闲之辈。著名的政治问题撰稿人和评论家通常是谙熟内幕的行家里手，对宦海沉浮的政客抱有“尔等藏宝剑，吾有笔如刀”的态度，常常把摄像机镜头深入到党派交易的幕后，弄得首相、大臣也要避让三分；大批专吃政治报道饭的记者，尤其是三大电视广播网和大报政治部的无冕之王们，一旦嗅到蛛丝马迹，便是穷追猛打，直到政治丑闻昭然若揭，政客退出政坛为止。新闻媒体对政府和党派的监督，确实部分地起到了健全社会肌体的作用，虽说不能根除腐败和其他流弊，倒也十分必要且带有一定进步意义。

第三，影视媒体的宣传取代了政党本身的组织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党构成形态。在旧制度下，党员数量曾经是政党刻意追求的目标之一。社会党曾经把“百万党员”作为自己组织发展的实际标尺；自民党在总裁选举时，也曾制造过“数百万党员”的效果。理由无非两点：其一是大量党员交纳党费、购买党刊构成党的经济基础；其二是人数众多便于将党的政策主张由党内宣传到党外，即能够有效地扩大党的影响力。

④

1994年《政党助成法》颁布以后，政党资金来源发生变化，依靠众多党员维持党的财政的“泥多佛大”已经失去意义。同时，依靠众多党员为本党做宣传或扩大组织规模的必要性，也受到信息化社会的挑战。大众传播媒介的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人际间的直接宣传，只要党首在电视上阐述政见，公众就可以通过媒体了解该党的政策主张。所以，以党员人数衡量党势已经成为过去。不少政党的党首（如自由党的小泽一郎）宁肯把经费花在电视台的广告费上，在五花八门的商品广告中加进一段自己的说教，用言简意赅的语言劝说选民为自己投票，也不打算花费资金按人头扩大党势了。这样一来，以往组织上从中央到地方，结构上从领袖到党内核心人物及至中坚干部、基层干部，直到广大党员的金字塔结构就显得过时，转而趋向以党首为核心联络为数不多的追随者组成的“精英政党”。

此外，影视媒体还兼有联系政界与民众的桥梁和平衡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作用。日本的政治作为治国之术，带有浓重的“密室政治”色彩，在争夺执政权力和主导地位的层面，往往带有权术和谋略的性质。不过，“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亡，在逆民心”，政府的重大决策常常需要电视向社会“吹风”，给国民“下点毛毛雨”。而在很多国民眼中，政治是肮脏的职业。尤其是在经济景气低迷危及大众生活之时，迁怒于政治家的公众总是需要一块发泄愤懑的园地。日本没有类似伦敦的“海德公园”，于是，在电视上观看抨击时政的试论及在政党的叫嚣便成了大家宣泄怒气的“主渠道”。

总之，政治与大众传媒像一对孽缘夫妻，处于相依相伴又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中。但无论如何，党派和他们的领袖人物只能“善待”大众传播媒介，并在各种传媒载体上努力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

时至今日，日本的政党制度仍处在变动之中，各种关于未来政党模式的理论探讨——不管是断言将实行两党制或是描绘多党制图景，无一不是有待验证的假说。但有一点却是明确无疑的：作为政党政治发展变化潜在动力的社会运动永远不会停息，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对政治准则的认识与政党政治的理解必然会发生变化。目前，日本国民既不希望自民党过分强大，也不肯将国政托付给非自民党联合政权的复杂心态，恰恰反映出传统意义上确立一个理想、构筑一个权力中心、由一个政党独家维持社会与政治稳定的结构正受到某种挑战。因为，一元的稳定容易倾覆，只有建立在多元基础之上的价值观和多元权力基础上的社会和政体才有可能持久而稳定的观点，正渐渐成为传播媒体、社会群体乃至公民主体的共识。恐怕这就是自民党能够保持对其他政党“一强多弱”优势，但却无法恢复往昔君临天下之强盛局面的根本原因所在。

①绵贯让治·三宅一郎：《环境变动と态度变容》第1章、第7章、木铎社、1997年。

②按照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推算，2007年总人口将达到1亿2778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龄者大约占20.7%；至2025年和2050年，老龄者的比率将分别达到27.4%和32.3%。转引自〔日〕《情报知识イミダス》、1998年版。

③《环球时报》1999年1月29日，潘健《日本报业：颓势1999》。

④石川真澄：《今政党とは何か》、岩波书店、1998年、53-54页。